

新移民文学中抗战书写的伦理表达与双重情感

Ethical Expression and Dual Emotion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朱云霞 (Zhu Yunxia)

内容摘要: 新移民文学中的抗战书写, 融入创作主体的跨区域、跨文化经验, 将战争作为思考人性、道德、族裔等问题的特定伦理环境, 叙事中的伦理表达集中体现了作家的民族情感与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肯定。论文认为“他者”伦理困境揭示了战争创伤的多重性、普遍性以及人类共同情感的可贵性; 以伦理身份的迷失思考战争的残酷性与历史的局限性, 意在强调人性、责任以及人类共同情感对于身份重构的重要性。而抗战书写本质上是新移民作家的伦理选择, 既以民族代言人的责任感建构审视战争史、民族史的伦理视域, 抒发浓厚的民族情感, 又以超越“本土”的理性意识, 表达对人性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 抗战书写的教诲功能和道德启示呈现出超越国族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 新移民作家; 抗战书写; 伦理问题; 民族情感; 人类共同情感

作者简介: 朱云霞, 文学博士, 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2017WB22】阶段成果。

Title: Ethical Expression and Dual Emotion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ross-reg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creative subject. In the texts, writers regarded war as a specific background for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morality, ethnicity and other issues, the ethical expression in the narration presented the writer's national emotion and affirmation of human common emotion. The ethical dilemma of foreign "others" reveals the multiplicity and universality of war trauma, the value of human common feelings. The loss of ethical identity shows the cruelty of war and the limitation of history,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nature,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 common feeling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Ethical choice of New Immigrant writers, who not only reveal trauma, criticize war, and examine the maternal culture with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spokespersons and strong national emotion, but also express their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and the common emotions of human beings with a rational consciousness beyond “native”.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riting ha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beyond national, cultur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 writers; Anti-Japanese War writing; Ethical issues; human common emotion; national emotion

Authors: **Zhu Yunxia**,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She mainly engages in the study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yxzhu@cumt.edu.cn).

“新移民”主要指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从中国大陆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既有深厚的母体文化记忆，又在迁移和流动中积累了丰厚的海外经验，其文学创作与中国当代作家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就抗战书写而言，当代作家多将视域放在民族国家内部，以国人作为抵抗主体或受创群体展开叙事，而新移民作家在承续现代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跨区域、跨文化经验，对抗战历史的重述、对人性与伦理问题的思考都展现出新的审美特质。陈河的《沙捞越战事》（2009年）、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2010年）、哈金的《南京安魂曲》（2011年）、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2015年）、张翎的《劳燕》（2017年）等都是代表性文本，作家将自身处于多重文化交汇点的跨域经验沉潜在叙事中，通过战争建构特定的伦理环境，表现不同国族/族群、阶层/性别的人在战争中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难题，叙事中的伦理表达集中体现了作家的民族情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目前，学界多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探讨抗战书写的意义和价值，但对于海外华人作家来说，抗战书写不仅是如何“叙述”的问题，写作本身也是一种伦理选择，在祖国和移居国之间以文化中介者的身份探寻、呈现多族裔抗日史，肯定人性与人类共同情感的可贵性，抒发家国情怀也以历史叙事建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视域，是他们理解抗战叙事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功能的表征。聂珍钊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入解析新移民文学中抗战书写的伦理表达，考察作家的伦理意识与情感表述，为我们总结海外抗战叙事的独特价值及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现实意义提供了有效的思考路径。

一、“他者”伦理困境与反思战争的角度

设置伦理困境的形态是作家文化经验的表征。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在史料或史实基础上，注重以民族国家之内异族“他者”的伦理困境重返历史

语境，以建构反思战争和历史的多元视角。这与作家移民生存体验中对族裔政治、文化差异的敏锐感知有关。“他者既是另一个主体，也是中介了与其他主体之关系的象征秩序”（汪民安 381），借由“他者”在特定文化空间的生存形态和伦理困境，一是突破了过往抗战叙事的政治纠葛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反思战争中受害者的特殊形态和多元心理结构，能够进一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创伤的多重性、普遍性；二是在多族裔交往的混杂空间中，“他者”的相对性及其所折射的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呈现了世界语境中抗日战争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共同情感的可贵性。

在抗战书写中，如何讲述南京大屠杀事件造成的伦理困境与创伤记忆，是极具挑战性的写作实践。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突破传统叙事结构，以南京城中非本土化的威尔逊教堂和金陵女子学院为特定空间，形塑异国“他者”群像，由“他者”伦理困境讲述大屠杀期间不同族裔、不同群体的生存之困与灵魂之痛，进一步呈现了讲述的客观性和象征性。教堂和女子学院的美国背景标识了故事发生的空间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混杂性，“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作‘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麦克·克朗 78）。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活动在这类空间的神甫、传教士和商人等群体是文化上的“他者”，其祖籍国的背景往往赋予他们在中国生活-行动的优越性，在常态语境中与本土民众形成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日本侵华其间也拥有与强势者对话、斡旋的话语权和中立位置。然而，战争改变了权力施行的方式，异国“他者”的处境、精神状态、行为选择与中国民众的创痛交织共生，人的道德属性、理性意识和人性价值赋予“群体”和“身份”新的解读面向，在人性和兽性的博弈中所要彰显的是人类情感的共同性。

《金陵十三钗》中威尔逊教堂的英格曼神甫以宗教意识影响下的高雅、威严和理性建构其作为异族“他者”的文化身份。但日军屠城期间不断加剧的两难处境摧毁了他保持宗教理性和“中立”的可能。最初，英格曼面临是否收留妓女的道德困境，在无奈、反感又同情的复杂情绪中选择默许。而后，是否接纳垂危士兵带来职责困境，允许意味着教堂不再中立将无法保护其他生命，拒绝又是对良知的挑战，但在生和死的紧要关头，神甫果断地打开了教堂之门救助中国伤兵。让英格曼真正陷入心灵之痛的是责任、情感与道义混合的伦理困境。日军屠城的残暴已挑战人类底限，神甫被打、手无寸铁的伤兵和雇员被杀，女学生也成为日军觊觎的对象。在极致环境下让妓女代替少女“赴约”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拯救方案。这一选择刺痛英格曼的灵魂：“他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生死抉择权，替上帝做出优和劣的抉择？”（严歌苓 196）虽然心理上做出了主动选择，但“牺牲”一个群体拯救另一群体的方式，又与人

性和信仰相悖，因此造成心灵之痛。这里所要呈现的不仅是伦理两难造成的个体灵魂之痛，更是对日军反人类行为的谴责和控诉。

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以文化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在讨论关于“大屠杀”叙事时认为“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操作，‘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才能被建构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陶东风128）。经过符号性转换，特定情境的创伤事件才能具有普遍价值。在叙事中，将受害者经验扩展至多民族的经历与感受，呈现民族战争中的“他者”伦理困境，超越特定的历史和国族冲突，也是符号化表述的方式之一。《南京安魂曲》对民族创伤历史的再现同样以异国“他者”作为观察视角。哈金以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校长美国人明妮·魏特林为核心，讲述安全区的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乔治·费奇、爱德华·施佩林、霍莉等在日军屠城时竭力救助无辜、抗议暴行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形塑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异国“他者”群像，呈现了战争的残暴与人性的美善。魏特林是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校长，日军屠城时女校转变为难民营，原则上只接受妇女和儿童，但遍城难民无处可去以及年轻男孩被杀害的状态让魏特林陷入困境，这是职业伦理与道德情感的冲突；最大的困境是安全区并不安全，以魏特林为代表的外籍人士尽力保护普通民众，而日军从安全区强行抓人，公然闯入难民营奸污女性，守护难民的人道与日军毫无人性的残暴让他们处于无奈、愤怒又悲痛的境地，魏特林始终不能原谅自己轻信日本士兵，让他们进入难民营“挑选女人”的失误选择。作为“他者”的外国人在战争中利用其中立位置，尽可能庇护难民，但困境中的挣扎与见证日军暴行的震惊共同造成另一种战争创伤，南京大屠杀两年之后，魏特林因精神崩溃而患上抑郁症。以此，大屠杀就不再只是本民族的历史创伤，战争造成的伦理困境和精神创伤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与严歌苓、哈金在特定战争事件中讲述“他者”伦理困境的方式不同，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和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角度，以抗战参与者的行动为线索，在多族裔交往的混杂空间中，将“他者”伦理困境相对化，呈现同盟者抗日心理及不同族裔背景的群体/个人面对伦理困境的差异性，在批判、反思战争的基础上强调人性价值，具有鲜明的世界视野与人类共同感意识。《沙捞越战事》以加拿大华裔青年周天化的抗日活动为轨迹，将多族裔抗日同盟的活动空间放在马来亚沙捞越丛林，不仅再现了英国人、马来亚华人的抗日历史，还呈现了被当地人视为“他者”的少数民族群的伦理境遇及其特殊的抗日动机。对于土著达雅克和依班族来说，日军侵略改变了丛林规则下的自足生活，野蛮抗争是近乎本能的选择。但依班族的猎头习俗让日本人以更野蛮的行为进行报复，他们进入禁忌荒岛“阿娃孙谷”轮流奸污少女，烧掉庇护所。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虐通常被视为兽行，但将其

兽性与少数原始族群的自然性、野蛮性相对比，提供了令人深思的伦理混乱隐喻，正是入侵者放弃了社会伦理准则，导致其他族群陷入多重困境。以此，“野蛮”和“他者”就具有了相对性，对日军丧失人性与伦理失范的批判以超越特定族裔的方式表现出来。《疯狂的榛子》也有同样的思考。中美混合联队的空军队员在战斗中被迫逃生，他们坠落在一个原始部落“猎头族”，但战争中的人性意识改变了原始族群对待伦理困境的方式，酋长说：“在这一带，没有人敢拿你们的头，因为我是酋长。日本人在中缅印边界，杀了我们族里不少人。我们猎头族也和日本人开战了。你们打日本，我们不拿你们的头”（袁劲梅 96），无论多么野蛮的族性，在相同的困境面前，都会激发出与异族群体相同的恨和爱，以此重构伦理意识。“他者”伦理困境所提供的既是对原始族群中自然伦理的重新认识，也是对现代社会结构中殖民和侵略的再审视，体现了世界语境中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呈现不同群体多元而特殊的心理结构，并未消解批判与反思的力度，对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情感的强调是立足当下回望历史的责任担当。

二、从战时到战后：伦理身份的迷失与重构

强调战争中伦理身份对个体内在情感与身份认知的影响，是新移民作家抗战书写的另一重要特征。他们笔下的跨国界者、移民者与诸多普通民众都被战争改变了固有的社会位置，人的日常性思维被迫与战争的非常态性、极端性联结，个体陷入挣扎、分裂、不堪和苦痛的困境，行为选择与正常社会结构中的道德规范无法统一，造成特定情境下伦理身份的迷失。这里的伦理身份主要指家庭身份、族裔身份和社会身份。聂珍钊在讨论身份问题时，强调人的身份是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认为自然选择从形式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伦理选择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伦理身份进行确认（《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3）。新移民作家以不同个体/群体伦理身份的迷失揭示战争对人类伤害之深，但如何通过选择实现伦理身份的重构或确认，则是作家寻求救赎或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局限性的伦理诉求。

一是原本没有身份危机的中国人，战争导致其生存状态畸变，造成伦理身份的迷失。《劳燕》中的姚归燕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和贞操，尽管被牧师救活并获得了新的名字“斯塔拉”，但她并没有在命名中获得新生，因为她的家庭身份被悬置：“若依照那张盖了指印的文书上的说法，她早已嫁作人妇。可是她却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妻子，一天也没有。若说她是姑娘，她却早已失去了童贞，可是她却又不能被称为媳妇。天底下没有哪个名词可以准确地界定她的名分，她是陷落在孩子和大人、闺女和婆姨中间的那条阴沟里的怪物”（张翎 246）。无法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塑造相应的伦理身份，姚归燕找到自我的方式是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即便在战后被美国士兵伊恩抛弃，也不再迷失，她以母亲的坚毅和医生的职责在困境中做出

一系列选择,从而超越战争创伤,完成伦理身份的重构。但战争造成的身份迷失并非都能通过个体的理性选择获得再确认。在《南京安魂曲》中高安玲一家的痛苦,主要源于战争造成的身份错乱,他们被战争强加了“身份”之痛,道德规范与伦理身份无法统一,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高安玲在南京目睹了日军屠城的残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儿子浩文却在日本留学其间和日本人结婚,并被日军征召入伍到中国参战。作为母亲,高安玲深爱儿子,但无法接受他的双重身份。对浩文来说,身份错乱是导致主体分裂的根源,作为中国人的族裔身份、日本军医的社会身份和中日两个家庭成员的身份,使其身份认同和伦理意识错乱,造成灵魂之痛。战争结束后,浩文以汉奸之名被刺杀,个体无法认同自我和不被社会认同的处境似乎结束了,但伦理身份迷失造成的困扰与痛苦并未终结。高安玲作为大屠杀的证人到日本参加战犯审判,却不敢与在日本的儿媳和孙子相认,从家庭责任和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说族裔身份限制了家庭身份的确认。战争造成的创伤多重而且深远。

二是在叙事中融入创作者的海外经验,表现移民者在战争语境下社会身份的迷失。《沙捞越战事》中的周天化是出生成长在温哥华的移民者后裔,他并非因爱中国或加拿大而抗日,只是希望通过参军改变没有国籍、没有政治权利的华裔身份。但穿上加拿大军装后,周天化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为谁而战”。从表面看这是族裔身份的干扰,作为黄皮肤的加拿大人周天化讨厌白人,有华裔血统却与当地华人游击队格格不入,实质是他没有认识到作为军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和意义,责任意识缺失造成社会身份迷失。当周天化在困境中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以及抗日的紧迫性时,军人的责任感被唤醒,他选择牺牲自我以完成使命,成功发出电报,改变了英国空军的作战情况,个体因职责意识获得伦理身份的确认。尽管海外华人的抗战史在其移居国被有意或无意遗忘,“遗忘”暴露的是不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尴尬处境,但从个体角度而言,普遍伦理责任的实践是伦理身份不再迷失的表现。作者对周天化的牺牲未做评价,只是冷静地呈现其选择过程中的勇气和使命感,人的道德属性和职责意识以超越族裔身份的方式被肯定。文本还表现了与周天化处于相同困境的加拿大日侨群体,在二战中他们因日裔身份遭受隔离,而加拿大出于战争需要又鼓励其参军抗日,祖国情结与现实处境让日裔青年陷入身份困惑,“为谁而战”同样是巨大的精神困扰。作者借用日侨长者吉岛茂表达对移居者国族身份与伦理责任的思考:“你们生长在加拿大就是加拿大人,而且你们必须忠于你们自己的国家”(陈河 193)。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空间中,职责意识对伦理身份的确认起着关键作用,似乎为加拿大而战的使命感能够重构族裔身份。但群体内部的想象性认同,并不能让主体获得伦理身份的确认。与华裔不同,日侨是以加拿大士兵的身份与祖籍国开战,道德情感与职责意识构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伦理两难造成任何一种选择都会带来心理创伤,根本原因是伦理身份无法通过理性选择与道德规范相一致,

他们注定是民族战争和族裔政治的牺牲品。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新移民作家以不同群体的伦理处境呈现战争的残酷性与历史的局限性，战时及战后个体/群体伦理身份的重构或确认受制于多重因素。姚归燕所处的中国现代语境是“启蒙”和“救亡”理念共存，她的理性选择符合时代发展的倾向，因而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重构社会身份。而高安玲一家与加拿大移民群体所面临的政治文化空间更为复杂，他们的身份问题和伦理境遇既在民族—国家之内，又无法用单一逻辑面对，跨国经验所培育的民族情感和族裔身份具有混杂性，新移民作家更关注如何以伦理问题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束缚。对此，新移民作家融入自身的跨国经验，换种角度重述历史，以西方人在中国语境中的族裔身份认知与理性表现强调人性、伦理责任以及人类共同情感对于伦理身份重构的重要性。

《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和《劳燕》都表现了抗战语境中西方族裔在中国的身份认知，主要有出生成长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第二代法比神甫、长期生活在中国具有本土化倾向的美国牧师比利、因职业需要在中国游走的传教士/教师明妮·魏特林和霍莉等，他们的国族身份和社会职业身份相对明确，认同纠葛最初体现在情感或文化层面。而经过伦理选择之后，个体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实践获得新的身份认知，“我”属于哪个族群、哪个国家不再重要。找到自我的方式，是在具体的选择中以理性意识、职责感、道德感重构社会身份，这里的“社会”在叙事中主要表现为以人类共同情感、共同命运为基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或民族国家观念的公共空间。

对于《金陵十三钗》中的法比来说，情感上更认同养育他长大的中国婆婆，到美国与亲人相聚时有强烈的疏离感，所以选择回中国生活。任职于教堂的法比，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已经本地化，但在族裔身份和国家层面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以隔断和羸弱中国的关联。这种处境造成法比精神上的孤寂，“谁都不认他，对生的种族和养他的种族来说，他都是异己”（严歌苓39）。法比超越族裔困扰的情境，是不再做战争的“局外人”。对日本侵略者兽性的愤怒、保护弱小的正义感、责任感、同情心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男人，必须站出来阻止身边的女性受到异族凌辱。伦理责任与作为“中国男人”的伦理身份相统一，法比抵抗日军暴行的行为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不再局限于国族差异。历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反思和铭记，日军因伦理意识丧失造成人类灾难，人性正是在与残暴的对抗中获得超越苦难和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在《南京安魂曲》中，哈金借霍莉之口进一步肯定超越国族束缚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和仁爱精神，霍莉在救助南京难民之后，决定奔赴下一个战场，她和中国人安玲有这样的对话：

“失去房子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和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了，我喜欢不喜欢都是如此。这是我的第二祖国，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我钦佩你的仁爱之心，霍莉”（哈金 146）。

“国籍只是一张纸。我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我说过的，我是独立一人”（哈金 243）。

作为移民者，霍莉对第二祖国的认同并非如周天化对加拿大国籍的渴望，族裔身份在她的价值判断中并不重要，基于在战争中与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感体验，她更强调人性和普遍伦理责任对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战争叙事应当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侵略战争本身就是民族本位主义的结果，用一种民族主义反对另一种民族主义恰恰认同了侵略者的逻辑。因此，战争文学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表达各民族的共同情感，使之成为弥合民族、国家隔阂，促就和平的黏合剂或桥梁（汪正龙 27）。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者，新移民作家的文化观念更趋向于跨国性，以跨越地理和政治边界的伦理意识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在抗战书写中对人性光辉与人类共同情感、共同命运的强调，也是新移民作家超越狭隘的族群意识或民族主义观念的表征，战争叙事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品格。

三、伦理责任与审视历史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抗战中不同族裔多元文化心理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超越，并不意味着放弃家国情怀和民族立场。抗战书写本身是一种伦理选择。以书写“南京大屠杀”来看，“很多中国的实力派作家都曾写过抗日战争，但都绕过了南京大屠杀。倒是海外的华裔作家，仍在不断地书写这一历史悲剧”（洪治纲 21），创作者打捞散落的史料和记忆，重返历史现场，直面人类的残暴和伤痛需要勇气，是极为痛苦的体验。哈金在写作中精神受尽折磨，两度中断，历经近 40 次修改才最终完成，但他说“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创伤，而这件事情要是不说清楚，就像一道久不愈合的伤口，老在发作。虽然一本书、两本书也不可能就使伤口愈合，但是总得做，总得想办法”（单德兴 哈金 21），选择抗战主题是新移民作家伦理责任的表现。哈金在论述性著作《移民作家》中表达其责任意识：“虽身在海外，但不能忘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虽不能回到祖国 / 家，但他可以用文学作品替本民族人民说话，同时他坚信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穿越任何障碍回到祖国”（陈爱敏 陈一雷 156）。这种为民族代言的责任感是哈金写作《南京安魂曲》的重要因素，也是诸多新移民作家重返抗战历史的驱动力。书写本身是抵抗遗忘寻求救赎的责任承担，抗战叙事的目的则是通过剖析不同群

体 / 个体伦理选择的过程, 呈现“伦理责任”对个体与时代、民族与国家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以担当意识与责任缺失进行比较思考, 建构审视战争史、民族史的伦理视域, “为人类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提供不同的生活范例, 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启示, 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文学伦理学批评: 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9)。

严歌苓曾说《金陵十三钗》是“非写不可的作品”, 身处异邦让她对族群有更清晰的“自我意识”, 这种意识让她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严歌苓 69), “他者”境遇和民族内部视角形成极具张力的艺术空间。并且严歌苓对本民族历史的反思选取的是“边缘”角度, 塑造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妓女群像, 女性的性别身份与选择具有丰富的象征性。从群体属性来说, 妓女通常被视为道德规范中的另类, 其品性很难与英雄气质关联, 但在战争语境中, 人的道德意识和职责感被唤醒。最初妓女在神甫眼中是“动物”, 女学生心里是“妖怪”、“邪恶女人”、“最厚颜的人”, 因之造成群体间的道德矛盾, 但当妓女们以主动献身的担当意识救助更弱小的女学生免遭日军蹂躏时, 社会边缘者的担当意识和道德情感升华成具有自我牺牲的英雄气质, 固有文化观念被解构。对女性尤其是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尊严和社会地位的思考, 就不是简单地赋权, 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解构固有角色认知的重要方式。妓女和女学生, 在社会认知中处于两个极端, 不洁和纯洁所象征的也正是文化结构中“边缘”和“主流”的价值判断。当妓女伪装成女学生去见日本兵时, 她们不只是反转了自身的社会位置。对少女们纯洁之躯的守护也正是抗拒侵略, 维护民族主体性的内在诉求, 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里, 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 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 “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 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 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国耻, 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 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严歌苓 69)。严歌苓对战争中女性的位阶和处境有深刻的认识, 但她更注重表现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妓女们的伦理选择并非没有挣扎, 各有顾虑和考量, 尤其是不能尽到对父母、家人的责任而犹疑, 其中玉墨的理性选择是作者伦理意识的表现, 其自审和自主意识影响了其他女性的选择。而选择过程中的犹豫和矛盾, 体现了施暴者制造伦理困境的残忍, 更是对承担者、牺牲者人性之光的肯定与颂赞。战争叙事的意义, 正在于以两难之中震撼人心的伦理选择引发读者与文本生发互动, 获得精神启示与理性反思的能力。

张翎的抗战书写也触及日军对女性的强暴, 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理性意识、伦理责任对人的影响。不同的是, 张翎批判战争的方式是将战争对人的影响放在审视人之困境中进行, 战争不仅是民族国家之战, 更是个体与习性、与社会、与自我的战争。对于《劳燕》中的姚归燕来说, 战争是家国之难, 但被日军强暴则是更真切的悲痛, 更不幸的是, 她还要承受来自民族内部传统

文化观念的压抑和抛弃，成为“不洁”的象征，被村民羞辱而精神失常。其中伦理责任的缺失是村民“看客”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他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不抵抗反而欺侮更弱小的受害者，张翎揭示他们的麻木与冷酷也是对本民族劣根性及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和审视。刘兆虎虽有牺牲生命以抵抗日军的精神和勇气，却和村民们的贞洁观念相同，逃离婚姻实则是推卸了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造成姚归燕被“抛弃”而再次受创。刘兆虎一再将个人悲剧推至战争，但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与责任缺失才是束缚他的本质，影响了情感选择和价值立场。尤其是，被刘兆虎和村民抛弃的姚归燕，获得了牧师和美国军官伊恩的爱，虽然他们爱的是一个被现代文明洗礼之后独具个性的姚归燕，但爱的能力与主动选择的勇气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本民族男性责任感不足的批判。

相对而言，姚归燕则寄托了作者的期许和深意。张翎曾说，《劳燕》真正的目的是讴歌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她对人类历经磨难依旧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怀有深深的敬意，姚归燕的特质在今天依旧有现实意义（王红旗 94），和平时代的困境虽然与战争年代不同，但人类需要面对自我、时代和绝境的理性意识与伦理责任。受尽磨难与侮辱，但经过多次理性选择不断与困境抗争，最后成为一个有担当意识并救赎他人的独立女性。姚归燕在面抗日训训练营的学员“鼻涕虫”的恶语中伤和意欲施暴时，经过挣扎与反思，不再妥协与沉默，在众目注视下检举控诉，并发出愤怒的呐喊：“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张翎 191），呈露创伤并非为了博得同情，而是通过理性选择在绝境中认识自我，同时激发训练营的士兵转变观念提升责任感和民族意识。姚归燕的抗议行为体现了作者对伦理责任的深度思考，在民族危难之际，唤醒他人的责任感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责任。这种正向能量转化在“鼻涕虫”的伦理选择中。意图强暴姚归燕时，“鼻涕虫”的本能欲望战胜了理性意识，他与伦理责任缺失的村民一样，是战争遮蔽下的另一种施暴者；被斥责时“鼻涕虫”的羞耻感、职责感和民族意识被激活，在战斗中做出与伦理责任相符的选择，为保护战友主动牺牲。文本通过他人的道德判断让“鼻涕虫”获得认可与尊严，也正是作者借由战争对理性意识与伦理责任的呼唤。

以此，女性在战争中的处境、担当意识、理性选择与周围其他群体在战争中的表现，以相异或互动关联的形态构成可供对比的批判性思考空间。严歌苓选择大屠杀中最残忍的“强暴”事件，事实上也是双重批判的立场，“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严歌苓 146），让被边缘化的妓女们以身体为代价承担救助弱小抵抗日军侵略的伦理责任，既对战争造成的伦理混乱进行批判，也是对本民族尊严何以失落进行反思和审视。《金陵十三钗》中，神甫法比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在拯救弱者时将自己转化成真正的中国男人以保护“本民族”女性，“他者”选择

隐含了作者对中国男性职责缺失的批判。《南京安魂曲》中的楚医生把魏特林女士比喻成真正的男子汉，认为南京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男人没有承担起打退侵略者的责任，女人孩子才遭受强暴和杀戮。哈金借助楚医生的反思，表达了和严歌苓同样的批判和审视，从历史的伦理立场呼唤中国人的责任感：

“这个国家需要怀着真诚之心，愿意奉献并且埋头苦干的人”（哈金 195），自审和呐喊也是以责任担当直面历史创伤，强调个体 / 群体勇于承担伦理责任才是民族国家新生的指向。以战争审视民族历史既是以书写抵抗遗忘，也是在回望中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但民族情感认同与叙事中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肯定并不相悖，家国之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基础。在《疯狂的榛子中》作者以深切之情表达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但也借用美国空军将领马希尔上尉的话说：“我们不要对中国失去信心。我们是盟军。没我们，他们打不赢；没他们，我们也打不赢”（袁劲梅 43），只有真正意识到守护“本民族”的责任与“他者”家园不可分割，需要共同承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责任，战争以及战后的创伤才能被超越。

结语

新移民文学中的抗战书写建构了历史空间和现代意识交互对话的时空体系，在叙述形态上是从当下时间出发，以不同方式进入历史现场，但叙事不只是再现历史，而是表达作家的“介入性”思考，呈现“此时”的伦理意识。以哈金、严歌苓、张翎、陈河、袁劲梅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既以民族代言人的责任感揭示创伤、批判战争、审视母体文化，也通过特定语境中的伦理问题表达对人性和人类命运和人类共同情感的思考。袁劲梅说《疯狂的榛子》是“站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灾难踩在人心里留下的脚印”（袁劲梅 1），在她看来，战争的野蛮使人想要保留非野兽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更需要温暖的力量。哈金、张翎、严歌苓和陈河的抗战书写，也都以人间情怀和审视意识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关联起来，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思考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和世界，而对人性的肯定是他们以当下立场表达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认同，“人性体现道德，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道德存在差异性，尽管人性也存在差异性，但人性的本质是一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 11）。正是基于对人性本质的思考，新移民作家站在历史的伦理立场，又融入新时代语境下人们的道德情感诉求，表现战争所激发出来的“人类向美、向善、向和平、向世界大同的那样一种感觉的升华”（王富仁 168），这种升华是以超越族裔隔阂、性别歧视、文化差异的人性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旨在激发世人承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责任。抗日战争既是中国又是世界性议题，相对于中国作家，新移民作家游以走于多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中介者身份，借助抗战所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跨文化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

面，作家的伦理选择与对伦理责任的呼唤，能够引起世界各地华人群体的情感共鸣，提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识；另一方面，叙事中多族裔抗日共同守护人类命运的伦理责任，也为西方读者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自我”视角和情感基础，个体之责与作为“我们”的人类意识互动共通，进而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抗战书写的教诲功能就具有了超越族裔、文化和区域差异的普遍性意义，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独特的伦理价值。

Works Cited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 8-13.]

——：“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5) : 10-19.]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Wang Minan. *Key Words in Culture Studys*. Nanjing: Jiangsu UP, 2020]

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Mike Grang. *Cultural Geography*. Trans. Yang Shuhua, Song Huimin. Nanjing: Nanjing UP, 2003.]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

[Yan Geling. *The Flowers Of War*. Beijing: Writer's UP, 2019.]

陶东风：《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学术月刊》2（2016）：126-138。

[Tao Dongfeng. “From Progressive Narrative to Tragical Narrative——Two Ways Telling about the Holocaust.” *Academic Monthly* 2 (2016) : 126-138.]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

[Yuan Jinmei. *Hustlen Hazel*.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UP, 2016.]

张翎：《劳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Zhang Ling. *A Single Swallow*.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UP, 2017]

陈河：《沙捞越战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Chen He. *Sarawak War*. Beijing: Writer's UP, 2010.]

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

[Ha Jin. *Nanjing Requiem*, Trans. Ji Sicong,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UP, 2017.]

汪正龙: “文学与战争——对战争文学和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美学探讨”,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0): 25-31。

[Wang Zhenglong. “Literature and war——On the aesthetics of war literature and war description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Sun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5(2010): 25-31].

洪治纲: “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4 (2012): 20-30。

[Hong Zhigang.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2): 20-30].

单德兴, 哈金: “战争下的文学——哈金与单德兴对话”, 《华文文学》 4 (2012): 16-23。

[Shan Dexing, Ha Jin: “Literature under war- Ha Jin’s conversation with Shan Dexing.” *Literatures in Chinese* 4 (2012): 16-23.]

陈爱敏, 陈一雷: “哈金的《移民作家》与‘家’之情愫”,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2013): 155-160。

[Chen Aimin, Chen Yilei: “Ha Jin’s The Writer as Migrant and His Affection for ‘Home’.”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13): 155-160]

严歌苓: 《悲惨而绚烂的牺牲》, 《当代》 4 (2011): 69。

[Yan Geling. “Tragic and splendid sacrifice.” *Dangdai Bimonthly* 4 (2011): 69.]

王红旗: 《灵魂在场——世界华文女作家与文本研究》。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9年。

[Wang Hongqi: *Spiritual Presence —World 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Students of Their Texts*. Beijing: Modern UP, 2016.]

王富仁: “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 《河北学刊》 5 (2005): 167-170。

[Wang Furen. “The Memory of War and The Literature of War.” *Hebei Academic Journal* 5 (2005): 167-170.]